乡村学校也可以“小而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

几个小学二年级孩子，把一种可折叠的敏捷梯玩出了花样。开始只是撑起一个格子跳，后来撑起两个、三个、四个，随着被撑起的格子不断增加，跳跃难度不断提高，孩子们一次又一次排着队，奔跑跳跃。

这是河南登封大金店镇三里庄小学的孩子们的一个下午。本来老师中午拿出这个轻巧的训练器材只是让孩子们玩一会儿，结果，孩子们乐此不疲。他们不断制定、修订规则，不时商量、妥协、平衡，难度大了，就调低点让每个人都能参加；所有人都能完成后，再调高难度，游戏持续进行下去。

孩子们玩了近两个小时还不尽兴，老师答应他们明天还可以再玩。之后，老师给孩子讲起了绘本，在楼梯下一块人造草坪上，孩子们半躺半靠，享受着文字的魅力。

这样灵活的课程安排，在一些大的学校是无法想象的，而这所学校目前只有十多个孩子，老师可以稍微自由安排调整课程。

“原来有的孩子我们都注意不到，现在人少了，每个都是宝。”学校的校长王慧玲说，原来最多时180多个孩子。5年前，这个镇有16所学校，如今只剩两所乡镇学校、两所村小。

近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浙江等省份农村地区走访发现，乡村学校数量仍在不断减少，保留的学校很多也面临着生源不稳定的现实问题。但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出现，办得好的乡村学校开始吸引城里的孩子来读书。

这些城里的家长多数是不愿孩子为了分数“内卷”“外卷”“自卷”，主动选择到乡村进行“舒展”教育；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不适应班级、人数过多的城市的“大”学校，从而投奔“小而美”的乡村小学。

“中国的巴学园”是教育界人士送给四川广元范家小学的美誉。这所坐落在村庄中的美丽村小，孩子们在乡土课程、项目式学习、随处可见的图书中吸取着营养，在田间地头快乐成长，受到了社会的关注。校长张平原揭秘了学校的“密码”：打造“类家庭”教育场景，为留守儿童建立一个“安全、友好”的成长环境；教师从“制度管理者”转向“成长陪伴者”；乡土课程，滋养儿童成长……让孩子们在自由空间里学会自律，人均150册图书，都放在孩子们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虽然备受关注，但本校每年起伏不定的生源数量也让张平原这样的“网红”校长忧心忡忡。

“撤点并校”是从21世纪初开始，在2001年至2022年期间，乡村学校数量从41.6万所下降至7.6万所。教育部2024年10月公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4.35万所，比上年减少5645所，下降3.79%。另有小学教学点6.60万个，比上年减少10924个。

人口出生率下降，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迅猛发展，农村学校面临着种种问题，同时功能与定位也在发生着变化。

张平原也在思考乡村学校的功能定位，他给出了乡村学校的3个功能：让还在乡村生活的儿童在家门口上好学；为未来中国小班化教育蹚一条道路，还有一条是，给被教育伤害的孩子留一个去处。目前范家小学70多个孩子，有40多个孩子来自广元市以外，近20个是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慕名而来的学生。

已经有120多年历史的浙江诸暨斯民小学，像个村小中的“活化石”，立足乡土连续办学，传承生活教育的办学基因，培养了大量人才。但这所小学也曾一度面临着生源减少、学生外流，甚至将被撤并的窘境。海内外校友不愿看到书香校园少了读书声，多方呼吁保护、筹措资金、挖掘史料、拍摄影像，让更多人了解这所深山里的教育奇迹。

4月13日，山西运城闻喜县后宫中心小学，因为学生数量少，多个年级的学生一起跳篮球操。高年级孩子组成的架子鼓乐队在旁边配乐“助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摄

4月21日，河南登封大金店镇五小的小学生们在玩敏捷梯。他们不断创新花样、制定新规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摄

4月21日，河南登封大金店镇五小的小学生们在课间打乒乓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摄

3年前，斯民小学被批准跨区域招生，学生人数从最少60多名回升到如今的120多名，除了来自诸暨以外的浙江其他市县，还有60多人是从其他省份远道而来，本地学生反而成了少数。外地孩子有的住在学校，还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租住在村里，组成了一个伴读社区，现在这个社区已经有了几十人。

山西长治关头村，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的家乡。十几年前，看到昔日热闹的村小趋于安静，他非常痛心，多方呼吁、撰文强调“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从乡村开始，乡村振兴、乡村生态文明需要从教育开始”。他认为，在理论与现实的悖论的困境下，更应该发展“做人的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

在当地乡镇政府、村两委的支持下，他发起了“亲情、亲乡土、亲自然”的“三亲”教育。这种理念吸引了来自长治周边区县，以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学生。目前，有50多个孩子在这里读书，家长们则租住在村里，一边陪孩子读书，一边参与社区建设，甚至参与有机农耕，享受春种秋收的辛苦和乐趣。

现在关头村的房子已经成为“学区房”，租金甚至高于县城，但每年仍有大量家庭迁入，目前村里已无法容纳更多人。其中一些学生就是无法适应城市学校教育，选择到村野“舒展”身心。

今年4月，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山西省闻喜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了“乡村教育振兴大会”。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善槐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乡村教育的挑战与机遇。他指出未来乡村教育需实现“普惠、优质、田园、多样、现代”五大转型，并强调：“乡村教育不应是城市的‘附庸’，而应依托本土资源，打造‘小而美’‘小而精’的育人模式，为不同人生路径的孩子提供适切的教育。”

对于乡村学校的教育目标，贵州省正安县田字格小学提出了“走出大山能生存，留在大山能生活，面向未来能生长”。

两三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学校校长教师参加了这次“乡村教育振兴大会”，他们经过两天的讨论，达成了几点共识。

“农村小规模学校不仅是保障教育公平的托底需要，‘小班小校’也是适合城市和农村、面向未来的学校形态。”

“乡村教育要与未来乡村建设的需要有机融合，更大程度地引入乡土文化资源，开展乡土文化教育，走向特色化、多样化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开放教育，引入社会组织、企业、新乡贤等各种社会资源，复兴乡村的教育和文化。”

“要平衡知识教学与人的社会化这两种教育功能，把学生的生命成长作为更重要的评价指标。应当看到，‘成长’是比升学更重要的教育价值和目标，尤其是在农村的环境中。”

可以看到，那些吸引城市学生的乡村学校各有特色，村庄中、田野边，乡村学校有城市学校没有的优势，熟人社区，空间宽阔，乡土特色，山川风物，大自然这本“无字书”让孩子们吸收更多天然养分。

看到同类学校的变化，很多乡村教育工作者开始行动，想各种办法因地制宜把孩子家门的学校办好，让孩子们喜欢。

山西运城闻喜县后宫中心小学只有60多名学生，老师们把有些课程调整合并到一起，比如低年级一起上音乐课、体育课等。“富裕”出来的课时，孩子们学打架子鼓、学习书法、打篮球等。

“空间改造”是很多小学在实践的项目，闻喜县侯村中心小学教师杨茹玉惊讶于学生发散的思维，提出“旋转带轮柜子”“圆桶储物箱”，甚至要在教室里放沙发、扫地机器人。后来孩子们想到节约成本，提出用废旧营养餐箱制作书包柜；把二十四节气绘制在废旧黑板上……杨茹玉感到“每一面墙都在跟我‘说话’”。

也有一些学校在积极找寻“外力”。

河南登封大金店镇五小是一所实打实的乡村学校，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两年前加入了“原点项目校”，获得了培训支持，也获得大量图书。他们参加的“蜗牛读跑”项目，经过分组，孩子们自己统计，10周竟然能跑40万步、读35本书。

这所学校所有语文老师都加入“小喜鹊读书会”活动，为孩子们读绘本，引导孩子们讨论，并让孩子模仿绘本里的插图绘画、制作绘本推荐海报。

校长郑燕飞知道现在青少年心理问题严重，但是自己学校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学校这次心理健康测评，只有一个孩子可能有攻击情绪，其他的全部都健康，我感觉与阅读和运动是分不开的。我觉得运动就是治疗心理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心里有啥不痛快，可能出去打一场篮球就没事了。”他解释，心理测评是孩子们自己在电脑上答题，没有其他干扰。

“原点乡村学校计划”近几年在湖北、湖南、河南和甘肃等地约40所乡村小规模学校开展“蜗牛读跑”“小喜鹊读书节”“原点家校运动会”“远程教研”等活动，参与的学校师生都有了变化。

原点力行教育的创始人王丽伟这几年一直奔走在各地乡村教育一线，她看到，孩子们家门口的村小，给无法融入“现代工厂式”学校的孩子兜底，“要把这最后的一道网撤了，那可就都是硬着陆了”。

贵州大山里的乡土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继璇
记者 李雅娟

暮春时节，贵州省正安县瑞溪镇燕子坝小学教室窗外草木葱茏。窗边的一排长桌上，擀面杖、小碗、托盘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几口锃亮的大蒸锅滚着沸水，热气爬满了透着绿意的窗户——这是一年级的乡土课教室。

来上课的孩子们围坐在圆桌旁，这节课，他们要学习包汤圆。在开课前，孩子们舞起小手高声念道：“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惟以家乡，吾生有祥……感恩乡土，后福有望。”每节乡土课前，孩子们会一起朗读这段开课词，以提醒自己感恩脚下的这片土地。

在正安县，除了燕子坝小学，还有数所开设乡土课的小学。而这门课程的开发者是田字格公益创始人、贵州田字格小学总校长肖诗坚。从2017年起，田字格公益在贵州先后建立起3所田字格实验学校。

“乡村教育的目标不是为了掐尖、选优，而是基础教育。乡土是滋润我们的乡村教师、乡村孩子、乡村教育最重要的养分。”肖诗坚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主办的“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未来乡村教育交流季活动上说。

她提出了16字的乡土教育理念：立足乡土，敬爱自然，回归人本，走向未来。她希望接受这样教育的孩子留在大山，能生活；走出大山，能生存；面向未来，能生长，“重要的不是他们必须留下或者离开，而是他们要有生长的力量”。

为了让孩子们具备立足乡土蓬勃生长的能力，田字格实验学校用一门基础课+五门特色课的形式，提升乡村孩子的生存力、生长力和乡村认同力，能够在乡村中找寻到自恰的生存方式，学会如何与人、环境相处，不断向上生长，并认同乡土文化。“乡村教育不是培养离开家乡的人，而是培养在家乡也能找到未来的人。”肖诗坚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新蓉看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力。她在演讲中提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口大量增长，进城读书的务工子女在客观上减少了农村学校的生源。同时，“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也让农村学校大量减少，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教育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贵州省正安县瑞溪镇燕子坝小学，一年级学生在乡土课上学包汤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继璇/摄

贵州省正安县瑞溪镇燕子坝小学，学生在学包汤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继璇/摄

郑新蓉回忆起第一次参访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时的情景，孩子们在了解到她是北京市第十三届、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兴奋地写纸条问她：“郑老师，你是怎么选上人大代表的？人大代表是怎么分工的？”“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人民代表大会吗？”这些问题让郑新蓉感到惊讶，她虽然参访过不少学校，但从没有孩子提出过这些问题。

实际上，孩子们对这些问题的关切来源于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的特色课程之一——公共议事课。在这门课上，每名学生都能对学校的公共事务发表建议，好的建议通过后，全校学生会一起监督执行。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时，还会有“学生法庭”来解决纠纷。

在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的公共议事课上，面对论坛参访者，学生们站在展示屏幕前，落落大方地介绍自己的“提案”：“关于学校如何养羊的建议”“关于学校应该增加体育器材的建议”“学校的公益产品销售收入该如何使用”……在提出解决方案后，每一个“提案”都经过了师生的多轮讨论并进行举手表决，有些“提案”在欢呼声中通过，有些被大家热议如何改进，一只只举起的小手就是学生直接参与学校管理的真实写照。郑新蓉说，孩子们对学校的日常管理心里都有数，就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懂制度、懂规则、学做人，为未来步入社会做准备。

这也体现在燕子坝小学的乡土课中。在上“包汤圆”课时，教师李秋凌带领孩子们讨论家乡的美食与节日，介绍了包汤圆的流程后，她将一个个装满糯米粉的盆端到孩子们面前，大家戴起口罩与手套，有模有样地和面。面絮不时粘在学生的小手上，但大家并不着急，耐心地在老师的指导下调整水面的比例，互相帮助，协作完成了全部流程。当窗边大蒸锅里的水沸腾，一个个汤圆浮上水面时，孩子们拿着碗，排好队，等待老师舀取甜蜜的果实。

课程的尾声，李秋凌在黑板上计算每一组所包汤圆的个数，大家边吃着甜甜的汤圆，边跟随老师进行加减法的计算。“今天大家学会了包汤圆，就可以回去包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吃，大家一起吃汤圆代表了什么？”“甜甜蜜蜜！”“团圆！”孩子们热情地回答。

一节80分钟的“包汤圆”乡土课，涵盖了语文、数学、民俗文化、手工等多个知识要素，有着26年教龄的李秋凌非常认可乡土课的教学效果。“这是以学生为主的课堂，乡土课能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团结能力、合作能力。”她说，自己以前是数学老师，但自从学校引进乡土课程后，她惊喜地发现有时乡土课上的数学教学效果更好，“学生不再是死记硬背数字，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掌握其中的数学关系”。

田字格实验学校乡土课的教材内容来自孩子们身边的一切——家人、房屋、土地、动植物……肖诗坚希望通过体验式、探究式和主题式学习，培养“有根”的孩子，让他们与家乡建立紧密的联结，让他们能骄傲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影音书画

多给技术0.6秒

□ 焦晶娴

科幻作品中，“意识上传”常被当作背景设定：未来人类大脑的意识、记忆等能被上传至数字设备，人类最终实现“数字永生”。但如果“意识上传”技术被资本垄断，形成一门决定人类生存质量的生意，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黑镜》第七季开篇，主人公身患重病，脑中被植入备份意识以维持生存，但生活质量受制于信号范围和服务器速度。意识上传服务也分为三六九等，为了赚钱，她的丈夫在地下网站上伤害自己的肉体换取网友的打赏，供养与机器共生的“赛博格”妻子。在“上载世界”，“尊贵人类”靠科技增强现实感官，“普通人类”的感官功能被“夺舍”、死前还在念广告，就像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浮士德。

过去，《黑客帝国》探讨过“意识上传”消融虚实界限后的人类存在危机，《万神殿》提出虚拟克隆体也有自由意志。《黑镜》则更悲观、更具现实主义色彩，许多连带设定在真实世界都能找到参照物：“口播广告”就像在视频软件、社交媒体里无处不在的“信息流”广告，“笨笨网”让人想起直播平台上靠喝酒、“斗狠”盈利的“狠PK主播”，“一键控制情绪”则有脑机接口技术调节抑郁症患者情绪的影子……

《黑镜》中主人公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新技术，连同“贵的就是好的”“升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资本逻辑一并吞下，希望科技的灵丹妙药“药到病除”。但当他们发现已经难以承担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副作用时，只能被推搡着走向深渊。

“工具都有偏向性”，《黑镜》的编剧查理·布鲁克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纯粹的“技术悲观主义者”，“与其说我预言了什么，不如说是对已经发生事实的推断”。

科幻作品一直是人类对当下社会的投射。如果说《异形》《世界之战》等20世纪科幻电影反映了对冷战、移民、意识形态入侵的恐惧，那么如今《黑镜》《人生切割术》中的“数字永生”“情感异化”等议题，更多反射出人类对科技过分依赖、隐私与思想控制、寡头科技公司监管困难等恐惧。

科技发展得太快、人类记忆力又短暂，常会忘记来时的路。看到儿时的诺基亚、随身听、PSP，不少人会怀疑自己过去对于它们的痴迷。1985年电影《回到未来》中预测30年后的未来世界，其中一些不到20年就得到了印证。这也是为什么观众觉得《黑镜》越来越“不够过瘾”——人类的想象力与现实相比显得过于保守。

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提出，新技术被审视的时期可能是正当化的过程，“作为一个技术–文化复合体，传播技术总是先要被赋予一定的社会意义之后，才能够作为一个被驯化了的‘物’进入我们的生活世界”。

“技术没有好坏之分，也不是中立的”，历史学家梅尔文·克兰兹伯格总结。有时我们对技术的理解滞后于它的影响，最初人们歌颂互联网的开放与包容，直到“棱镜门”事件后，网络带来的隐私问题才被真正放大。

最近的“智驾”事故让人们反思，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和智能系统的关系。汽车公司在产品手册中写，“切勿依靠智能领航功能来应对突发的紧急情况”。德国全德汽车俱乐部研究表明，72%的自动驾驶事故发生在系统提示后2秒内，实际上驾驶员平均需要2.3秒才能完成有效接管。在高速公路场景，这个数值会延长至2.6秒。在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我们也需要留足0.6秒，审慎地思考科技留下的印记。

这时人文社科学者的“阴谋论”，反倒充当了人类社会的免疫系统：信息一定越多越好吗？有情绪感染力的内容才是王道吗？当真实成为一种稀缺物品，如何捍卫我们核实信息的权利？普遍的技术乐观情绪，只会把我们与“公共福祉”越推越远。

而更多普通人更实际的恐惧，或许是担忧不懂技术而被未来抛弃。如今“人工智能焦虑”正在席卷社交媒体：有人发帖问“29岁转行干AI是否来得及”，被网友劝诫“现在赚钱的风口就是开班让人学AI”。这些课程的受害者和过去被“区块链”“量子力学”骗局捕获者大概率是同一批，支撑他们的是对“科技改变命运”的深信不疑。

但事实上，我们攥着改变技术的命运的钥匙。每项技术诞生，其目的并不都是为了公共利益最大化。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算法信用评分使发展中国家小商户更难获得贷款，算法拒贷率比人工高22%。为了完成任务，人工智能可以“不懂装懂”、编造答案。《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提醒人们警惕技术“暴政”，以及人工智能对于个体经济价值和政治权利的颠覆。

诚实、公平、民主，这些难以被编码的价值观，需要技术制定规则来护航。为了防止《黑镜》的担忧成真，未来AI医疗中患者的支付能力不应直接与治疗方案和服务的算力水平挂钩，医疗中获取的患者生物学数据也应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每一次关闭个性化推荐、每一条迁移到去中心化平台的动态，都是对“技术应为人类服务”理念的投票。

《黑镜》电视剧海报